

中华文学五千年（二）

司掌龍的文学

刘毓庆



目 录

导 论 (1)

辞赋的嬗艳

一、汉赋的兴起.....	(12)
1. 汉赋的特质.....	(12)
2. 渊源与成因.....	(17)
3. 勃兴的机缘.....	(26)
二、司马相如与赋模式之建造.....	(31)
1. 相如与赋之全盛.....	(31)
2. 铺陈模式.....	(38)
3. 颂德模式.....	(46)
4. 讽谏模式.....	(53)
5. 咏物模式.....	(58)
三、汉赋的模拟与发展.....	(66)
1. 模拟之风的兴起.....	(66)
2. 模拟中的发展.....	(73)
3. 新的生机——小赋.....	(80)

四、赋的转化与流变	(84)
1.张衡与赋的转化.....	(84)
2.小赋的兴盛.....	(89)
3.使命的完成.....	(96)
4.赋的流变.....	(102)
五、骚赋意识的演变	(107)
1.天才的预感.....	(107)
2.悲剧意识期.....	(113)
3.怀旧意识期.....	(120)
4.隐逸意识期.....	(126)
六、辞赋的旁衍	(134)
1.“七发”之流.....	(134)
2.设论之流.....	(141)
3.连珠及颂之流.....	(149)
4.赋家的文学散文.....	(154)

“子”“史”的重演（上）

一、子学复活与政论的发达	(166)
1.诸子复活的特征.....	(166)
2.政论家的崛起.....	(171)
3.政论文的发展.....	(180)
4.论说的赋化.....	(200)
5.政论的端向.....	(212)
二、百家定尊与哲论的复兴	(221)
1.道家的哲论.....	(221)
2.淮南的哲论.....	(227)

3.荀门的哲论	(237)
4.董生的哲论	(248)
三、神学统治与文风的柔化	(256)
1.萎缩与病变	(256)
2.散文的修养	(262)
3.超越时代——《盐铁论》	(275)
四、经学内讧与散文的生机	(284)
1.古学与理性	(284)
2.从含蓄到典丽	(294)
五、清议与散文的精神分裂	(302)
1.政论的回光	(302)
2.散文的趋向	(310)
3.书信的发达	(322)

“子”“史”的重演(下)

一、从经传杂史到传记文学	(332)
1.经传之一瞥	(332)
2.传记的滥觞	(338)
3.《史记》的诞生	(346)
二、《史记》人物传记的光采	(355)
1.无韵之《离骚》	(355)
2.宏伟的画卷	(366)
3.伟大与丑陋	(374)
4.形象表现之奇	(381)
5.艺术讽刺之奇	(393)
三、史传文学的分裂和消亡	(401)

1. 走向纯史学.....	(401)
2. 走向小说领地.....	(411)

“诗经”的复兴

一、乐府诗的发展与净化.....	(426)
1. 旧诗式的重演.....	(426)
2. 诗式的解放.....	(432)
3. 净化与发展.....	(439)
二、诗体创新与诗歌的进展.....	(445)
1. 四言的衰老.....	(445)
2. 五言的形成.....	(453)
3. 七言的源起.....	(459)
4. 诗歌的进展.....	(465)
余 论.....	(474)

附表：	
中外文学发展史对照表	
(公元前 204 —— 公元 192)	(477)

导 论

不可否认，汉朝统一是中国社会一次根本性的转折。这不仅在于它将秦朝只建立了十几年的中央集权制确定了下来，更主要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和改造，规定了民族两千年的运动方向。如果我们排除政治、经济等表面现象的干扰，深入到民族意识、心理的深层进行考察，便会发现这个时代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文化复古。秦朝的文化专制，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但这个时代只延续了二十来年。汉人透过这短暂的黑暗，看到了先代文化的光明，并从战国耆宿、秦代过客的身上，发现了先代自由奔放的精神。就象欧洲人在罗马废墟中发现了古代文明而开始文艺复兴一样，在古代文化的召唤下，光复旧艺便成为汉代学人乐从的事业。

汉人的文化复古——更确切的说是崇古——是以整理散乱的古籍为基础的。《汉书·艺文志》云：

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

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为了“明先圣之术”，汉武帝时又设立了“五经”博士，授经传徒。这些博士以注释讲授古书为毕生事业，而良家子之于“六艺”，则严守师法，“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①。发展到东汉便出现了“累世经学”。

文化复古在汉初带有全面性，故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家，皆开始复活。到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成了单纯的儒学复古。但此时的儒学作为一种独尊的“国教”，已不同于原始儒学，它杂进了阴阳法道各家的学说，染上了“天人合一”、“三纲五常”神学宗教的色彩，被人当作了天经地义的真理、“明天道正人伦”的成法、尽善尽美的楷模。它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统治思想，渗透到了各个领域，控制了国民的灵魂。天下士子，唯儒教是学。到东汉则发展到了极点。《后汉书·儒林传论》云：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羸粮动有千百。其著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这些儒生以儒学为“利禄之路”，以求实现“学而优则士”的梦想。从武帝开始，在汉人传记中时常可见到因“明经”而被任职的记载，故时人有谚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由于过分的崇古、迷古、复古，使汉人失去了自我判断标

①《汉书·艺文志》。

准，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儒家经典为依归。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京兆尹隽不疑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辨其真伪，决定处理办法，而是依《春秋》成例判之^①。《离骚》本是一篇文学杰作，而王逸却说其“依托五经以立义”；司马相如尽铺陈之能事，班固却说他“与《诗》之讽谏何异”。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文化复古运动，本同文艺复兴反对基督教文化一样，是从反对文化专制、恢复学术自由开始的。最初发起于民间，汉初还表现出了复兴自由精神的趋势。但后来却变成了官方领导的运动，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使之失去了积极意义。在御用经学家的努力下，传统文化的自由活泼的精神被阉割了，而其糟粕、其躯壳却被保存了下来。故使这场文化运动取得了与“文艺复兴”截然相反的效果。“文艺复兴”使欧洲从封建及教会神权的枷锁下解放了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由。而汉代的文化复古，却使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绝境，活人完全被死去的古人所控制，儒家经典变成了教条和公式，没有神采的先圣骷髅变成了人生模式。人的精神被套上了桎梏，行为被划了范围，君臣关系成了机械的主奴关系，父子、夫妻之间失去了天性的爱情，人的性格开始变得沉静、拘泥、呆板。在儒学心理统治与封建专制的内外夹攻下，人们磨炼出了一套“克己”的硬功夫，行为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大大影响了汉人的创造天才，束缚了理智与感情的协调发展，使个性在痛苦的呻吟中走向萎缩。

第二、传统综合。日本学者和田清说，汉代是一个“注重传统的时代”^②，这是很正确的。尽管这个时代标榜“独尊儒术”，而在其意识中却融进了先代各种文化思想的因素。先秦华夏文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时以经义断事》一条，可参看。

②《中国史概说》。

化，可分为三个区域，即秦晋、齐鲁、荆楚。齐鲁文化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秦晋文化思想以法家为代表，荆楚文化思想以道家及楚辞文化为代表。在同一地域虽也可能产生几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但其基本精神却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墨家、阴阳家也同时出现在齐鲁，并与儒家抗衡，但他们与儒家一样，都是主张仁义、强调心理统治的。汉朝统一了国土，也统一了文化思想。汉承秦制，政治上完全继承了秦晋文化传统；“独尊儒术”之后，齐鲁文化思想则统治了意识形态。汉王朝建自楚人，故其精神、情感及社会习俗上，又带上了鲜明的楚文化特色。可以说，先秦是地方文化自由发展的时代，汉代则是百川归海的时代。但汉朝人在继承传统时，却阉割了传统文化的自由进取精神，将其残骸改制成了专制文化。秦晋法家文化本有变法革新、奋争进取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残酷无情的政治专制，剩下了依“法”杀戮不规的恐怖政策。齐鲁儒家文化本有原始人道主义、贵义贱利的精神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一堆限制人个性自由的思想教条。荆楚道家文化本有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反异化、反传统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消极的无为与服药成仙的幻想。楚辞文化本有追求探索真理、坚持斗争、保持人格尊严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悲观的忧伤和感叹。法家文化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变成了精神统治的枷锁，道家文化变成了退守自保的理论，楚辞文化变成了发泄感情的工具。于是民族便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支配下开始了两千年蜗牛式的运动。

第三、思维回归。在《古朴的文学》中，我们谈到了神话、诗歌、散文三个文学时代。这三个文学时代，实际上代表着民族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也代表着人类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神话的思维是虚幻的，叙事的，史学的；诗歌的思维是直感的，抒情的，艺术的；散文的思维是逻辑的，推理的，哲学的。这三个思

维发展阶段的完成，标志着人类思维的成熟。接着便出现循环、回归。秦汉第一次大循环开始，神话思维统治着这个时代，故而叙事文学特别发达，连汉赋、乐府都带上了浓郁的叙事色彩。汉季至五代，是诗歌思维主宰，故抒情文学昌盛。宋代则是散文思维统治，理学兴起，诗歌形式和内容都走向散文化。元明则开始了第二次大循环，神话思维积极活动，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是第一次循环。

民族思维每一次大循环开始，都意味着旧的应该死亡，全新的世界到了应该出现的时候。不管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历史却给了我们许多暗示。汉代结束了战国至楚汉几百年的分争，将和平奉献给了渴望得到它的人们。大统一帝国的强盛和繁荣，使民族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尽管专制摧毁了民主和自由，而却加强了民族整体的进取精神，培养了时代崭古切今的气势，故而使时代人产生了神话般的幻想。他们祈祷着、幻想着一个崭新世界的出现，实践理想的人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相如“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汉武帝出师胡越，张骞通使西域，董仲舒天人三策，淮南王神仙黄白之术，这些充满浪漫色彩的追求和学说，无不代表着时代的幻想，也无不表现出神话思维的特色。而“班马”的产生、谶纬学说以及方术、方士、阴阳五行等信仰的流行，大量神话题材的画砖的出现，无不是神话思维的产物。然而神话思维第二次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思维形式出现，已经不同于第一次的单纯和朴野，它带上了诗歌与散文思维的一些因素，故而没有创造出全同于上古的神话，而产生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产生了带有抒情色彩和浪漫气质的史学巨著和汉大赋。意外的是，此次思维回归和文化复古偏偏发生在同一个时代，而此时广漠农村的经济结构也没有出现可供神话幻想的变化，因此神话思维没有更多的去向往未

来世界，而是在古代世界的范畴里，创造出了神秘主义的宗教哲学，在尧舜禹之后，续编了孔子的神话。

文化复古、传统总汇、思维回归，这三者与专制而形成的政治向心力结合，左右了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使之表现出了迥异于历史各阶段文学的特殊形态。

首先，在楚辞文化的影响下，汉代出现了纯文学体裁——汉赋，并引起了全时代人的关注。而儒家文化又使这种纯文学的形式，拥有了非文学的精神，显示出政治化的倾向。

其次，文化复古、思维回归，唤起了文学的复古和回归。乐府是《诗经》的复古，“三贾”、晁、董等是诸子的重演，“史汉”是《春秋》等历史散文的复辟。更有趣的是连神话也出现了复兴。春秋、战国以来，神话几已消失，可是到汉代却又蔚然兴起。《淮南子》的大量神话因时代不明，且不必论。象纬书中的神话则几乎全是汉人的创造，如征在感黑龙之精而生仲尼，孔子见麟而预知刘氏王、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字，颛顼子死而为疫鬼，以及孔子海口、牛唇、舌理七重、虎掌、龟脊，首如尼丘山，身长十尺，大九围等，多不胜举。连颇有见解的司马迁也受到了新神话的影响，于《史记》中记下了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刘媪梦与神遇而生高祖等怪说。它如《风俗通》、《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徐偃王志》等，都无不充塞着神话的内容。《括地图》、《十洲记》、《神异经》、《洞冥记》、《汉武内传》、《列仙传》、《汉武故事》等大量神怪书籍，虽未必出之汉人，但却无不与汉人有关。《搜神记》今本有四百六十四条，而可确定出自汉人著作或为汉人传说的就有一百六十八条，实际恐怕远不止此。这种现象，既是神话思维回归的铁证，也是文学复古的最好说明。而晋以后大量志怪小说的出现，只不过是这种思潮的继续和结集。

其三，“复古”与“古”，大不相同，“古”是无意识的存在，而“复古”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在文学复古中，蕴含着追求理想模式的因素。尽管所谓汉代的文学复古、实际上 是学术、政策的复古。但在旧形式再次出现时，原始的混沌状态已不复存在，它已开始分裂，文学的意识已开始萌发。汪藻云：“左氏传《春秋》，屈原作《离骚》，始以文自成一家，而稍与经分。汉公孙宏、董仲舒、萧望之、匡衡以经术显者也。司马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当时已不能合而为一，况陵夷至于后世，流别而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连光景之文哉^①！”虽然汪藻与古之许多文论家一样，乃持历史退化论者，但他看到了汉代经术与文章的分裂，却是有眼力的。当然分裂的范围远不止此。在这种分裂中，人们开始认识从学术中分裂出来或正在走向分裂的文学的价值。如汉宣帝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②。”在《汉书》中常可见到“某善属文”、“某工于文”、“某言语妙天下”的字样。《后汉书》又专为列了《文苑传》。这无疑是文学观念兆萌的说明。

虽然这个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们还不具备清醒地文学意识，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活动产物的特殊性，故而开始了作理论上的分析、认识。刘安从《离骚》中看到了屈原的人格，开了文学批评的端绪；司马相如从自身的创作体验中，认识到了赋家构思之苦，对赋的表现形式与赋家创作时的精神活动作出了分析。司马迁审视了历史上哲人著述与个人遭际的联系，参以自

①《浮溪集·鲍吏部钦止集序》。

②《汉书·王褒传》。

身的感受，分析了作家创作时的感情形态，创造了“发愤著书”的理论。特别是扬雄，他从儒家政教理论出发，不仅对纯文学的赋作了分类和一定程度的否定，而且还对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淮南子等作了批评，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其后王充继承扬雄的理论，极力强调“文”的社会作用，推崇学术论文，否定辞赋。

然而在这里却暴露了汉代学者的基本弱点，他们虽然感觉到了文学的存在，而却不能从理论上将它与学术清楚的区分开来。尽管纯文学已产生，而却不能得到理论上的承认。因而他们的文学观是朦胧的，艺术模式的追求是朦胧的，文学的表现形态也是朦胧的。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时代文化思想与思潮影响的结果。

参考书目：

- | | |
|-----|-------------|
| 范文澜 |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 |
| 侯外庐 |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
| 金春峰 | 《汉代思想史》 |
| 林剑鸣 | 《秦汉社会文明》 |

辞赋的嬗艳

“专制”粉碎了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统一”铸成了民族整体的进取精神。皇帝
——民族唯一活泼的灵魂，只有他才是生灵
的司命之神。士大夫为他而歌，为他而悲，
为他讴出心灵的声音……

随着人类文化意识的发展，文学开始了摆脱政治、宗教、哲学、音乐奴役的努力，至汉代，一束纯文艺之花终于破土而出——汉赋诞生了！尽管它是古拙的、笨重的，缺少诗的灵秀之气和个性精神的闪光，然而它却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是文学脱离一般学术而独立的第一声呼喊。就凭这一点，我们也须大书一笔了。

赋是文学觉醒的先声，也是一代文学的正宗^①。不管道学先生

^①焦循《易经通义》云：“汉之赋，为周秦所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谓一代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们如何瞧它不起^①，但它确确实实地是统治了一个时代，耗费了一代文士的才华。也正因如此，所以它才真实地反映了一代士大夫阶级的动态和精神风貌，反映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社会建立初期的士大夫的欢乐和痛苦。

汉代辞赋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骚体赋，一是散体赋。骚体赋纯是步趋屈原的，内容以抒泻悲愁为主，基调是哀伤的；散体赋则有汉代文士的创新，内容以颂扬事物为主，微含讽谕，基调是平和的。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②”，这实际上是对辞赋作者、作风的分类。所谓“诗人之赋”，即是指“体同诗雅”、表现性情之作；所谓“辞人之赋”，则是指“侈丽闳衍”而少讽谕之作。前者多属骚体，后者多为散体。前者表现的是士大夫阶级人才毁灭的忧患意识，后者表现的则是士大夫阶级企图完善现实的善良意识。虽然骚体赋旨在写性情，也能客观地反映士大夫“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语），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苦闷心绪，然而能够代表时代、反映民族整体精神的却是那“丽以淫”的煌煌洋洋的大赋。通常人们所谓的“汉赋”，就是指后者而言的。

①汉之扬雄，就以赋为“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法言·吾子》）。唐裴延翰亦谓相如、子云之赋“讥多要寡，羨漫无归，不见治乱”（《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九《樊川文集后序》）。明薛瑄也以为“司马相如辈词赋，专尚华藻”（《薛文清公读书录》卷四）。

《草木子》、《调言长语》等又将“汉之文”与“唐之诗”并提，而置汉赋于不顾，此皆执文以传道之偏见所致。

②《法言·吾子》。按：关于赋之分类，刘氏《七略》及班氏《艺文志》皆分为四：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其分类所据，已不可晓。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及刘师培《论文杂记》皆有考证，可参考。

一、汉赋的兴起

1. 汉赋的特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它有诗的美质而无其轻妙，有骚的华赡而无其幽情，有文的排场而无其散漫，有画的直感而无其神韵。承雅颂之精神，得骚人之奇思，藏纵横之气势，成古今之博览。

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象汉赋这样典雅矞皇、洋洋大观的体裁了。汉儒虽将司马相如赋与屈骚列于同科，但汉赋实在是不同于楚辞的一种新文体。萧统《文选》将赋、骚分编，并将赋置之第一位，确属卓见^①。

那么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呢？所谓“赋”，就是铺陈、陈述的意思。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记襄王谓宋玉说：“试为寡人赋之”，而《登徒子好色赋》则云：“试为寡人说之”，《风赋》则云：“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可见“赋”与“说”相同，都是详细陈述的意思。刘沅《槐轩杂著外编》卷四云：“赋者，敷陈其事，故凡文字曰赋物，《春秋》言赋诗，后人衍为长篇而名曰赋，亦直叙其事之意耳。”这是很对的。关于它的特质，前人论及者甚多。汉赋第一高手司马相

^①赋为最早脱离学术而独立的纯文艺，其在文学上地位最重，故萧统将其列于卷首。后世诸家文集，多效法之。章学诚不愔此理而怪之，实误。